

陈平原

著



閱讀  
大學  
中文系

南方出版傳媒  
花城出版社

閱讀  
大學  
中文系

著 陈平原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阅读·大学·中文系 / 陈平原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5360-8314-1

I. ①阅… II. ①陈… III. ①杂著—中国—现代—选集 IV. ①C53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7139号

封面题字: 陈平原

出版人: 詹秀敏  
策划编辑: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杜小烨 陈诗泳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姚敏  
封面绘画: 邓晓童  
版式设计: 付诗意

---

书 名	阅读·大学·中文系 YUEDU DAXUE ZHONGWENXI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334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12.875 2插页
字 数	310,000字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阅读”“大学”“中文系”，这三个关键词，既是我近年演讲及著述的重点，也是媒体采访时最为关注的。这样也好，作为《京西答客问》的“续编”，本书终于有了正式的书名。除学术经历及时事话题外，书中大部分问答都是围绕这三点以及我已刊相关书籍展开的——有评介，有补充，有修正，也有若干很不错的发挥。但总的来说，本书仍属学术普及与文化传播。

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京西答客问》的“小引”中，我谈及同是采访稿，因观察角度不同，可以是“问答”，也可以是“答问”——前者属于新闻学，后者则与文章学接壤。作为中文系教授，你可以有自己的文章趣味；但问答毕竟不同于书斋写作，明显受话题选择、现场氛围、提问水平以及整理者趣味的影。只是在正式发表或成书时，我有权加以增删与润色——确实也是这么做的。在这个意义

上，不说那些书面答问，即便根据现场录音整理的，也都不是“原生态”。在我看来，既然落在纸上，且作为“文章”传播，本身就有经营的意味。

本书所收51篇答问，北京媒体占了将近四成，上海、广州媒体并列第二，这既是我的生活环境决定的，也代表了当下中国传媒文化地图。并非时尚人物，我联系较多的是纸媒，偶尔接受电子媒体采访，惊叹其效率与容量，但不太适应其不落地的传播方式。

为了吸引眼球，不管纸媒还是电子媒体，都喜欢在标题上大做文章，或出奇制胜，或惊世骇俗。可怜我那些正儿八经的答问，原本不太好玩，被冠上了精彩的标题后，总感觉有挂羊头卖狗肉的嫌疑，对不起读者。此次入集，大都改回了原样，但在文后注明刊出时的标题，以便检索。所收各文，略有修饰，若改动较大的，我会在文后注明。至于答问前面的“采访小记”或“编者按”等，或保留，或删除，或裁剪，取决于其提供的信息量多少。

以下几篇答问，体例或生产过程有点特别，需略加注解。第一篇近乎口述史，那是歌手兼作家吴虹飞刚从清华毕业，在《新京报》上做的尝试。当初编《京西答客问》时曾犹豫过，这回决定收录，看中的主要不是内容，而是文体。2012年夏，听说我辞去了北大中文系主任，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约做专访。这次访谈，整理成四则短文，连载于《语言文字报》；后又剪裁成《怎么学好语文，怎么教好语文》（2013年6月19日《中国青年报》），这里用的是完整版。至于初刊《文艺报》的《学者风范与学人本色》以及初刊《同舟共进》的《在追摹时回味，在鉴赏处反省》，是湖南理工学院教授余三定及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李浴洋，分别接受相关报刊的邀约，根据我以往的文章及著作，精心剪辑而成的。张双庆教授是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中

文系教书时的同事，身兼《百家》杂志社社长，为我编的这期专辑，某种意义上是送行之作。唯一没列提问者姓名的《媒体、大学与政治》，是我在凤凰网读书会演讲后的答问，根据北大出版社提供的录音整理稿修订而成。

有机会将颇为芜杂的答问编辑成书，除了感谢当初的采访者、发表访谈的各家媒体，更要感谢花城出版社社长詹秀敏女士以及责任编辑。

2016年2月13日  
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 目录 / Contents

小引

### 阅读

- |                  |     |
|------------------|-----|
| 惟愿一辈子读书          | 003 |
| ——答《新京报》记者吴虹飞问   |     |
| 警惕学者明星化倾向        | 008 |
| ——答《成都晚报》记者李兵等问  |     |
| 关于《筒子楼的故事》       | 015 |
| ——答《南方都市报》记者李昶伟问 |     |
| “别忘记苦难，别转为歌颂”    | 018 |
| ——答《东方早报》记者许获晔问  |     |
| “既有激情燃烧，也是歧路亡羊”  | 021 |
| ——答《深圳商报》记者刘悠扬问  |     |

当阅读被检索取代，修养是最大的输家 ——答《文汇报》记者吴越问	025
关于金克木 ——答《三联生活周刊》记者贾冬婷问	031
寻觅阅读的乐趣 ——答《新京报》记者吴永熹问	035
书里书外话“风景” ——答《新金融观察报》记者李香玉问	041
不凑热闹，不怕出局 ——答《环球人物》记者姜璐璐问	048
岭南文化如何“步步高” ——答《广州日报》记者谭敏问	052
阅读受制于社会趣味，这是个大问题 ——答《文汇报》记者黄纯一问	059
“读书无用”，是个伪命题 ——答《解放日报》记者王一问	066
请读无用之书 ——答《南方周末·名牌》记者王与菡问	076
远离热闹，不离人间 ——答《贵阳日报》记者郑文丰问	086
谈“晚清”，为何需要“图像” ——答《光明日报》记者李苑问	089



## 大学

- 站稳自家脚跟 重拾学术自信 097  
——答《深圳特区报》记者马璇问
- 参与国际学界的对话 102  
——答《北京大学校报》记者巴扬问
- 大学更应关注普通校友的“小捐” 109  
——答《新京报》记者高明勇问
- 当今大学难出大学问 115  
——答《中国科学报》记者孙琛辉问
- “好的校长演讲对学生来说是一辈子的事情” 121  
——答《东方早报》记者许获晔问
- 国家经济实力保证学者间的“平等交往” 126  
——答《文汇报》记者吴越问
- 大学的职责，首先是教学 130  
——答《南方都市报》记者赵大伟问
- 关于“高考” 137  
——答《南方日报》记者雷雨问
- 为中才立规矩 为天才留空间 141  
——答《人物》杂志记者何韬问
- 为何“民国大学校长”难以重现 151  
——答《看历史》记者刘杨、赵婕问

把心情压在纸背下	160
——答《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彭苏问	
以港为镜，透视内地高等教育	167
——答搜狐教育记者谭畅问	
不是把前面的拉下来 而是让后面的往上拱	176
——答《南方日报》记者达海军问	
重看“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182
——答澎湃新闻记者彭苏问	
媒体、大学与政治	190
——在凤凰网读书会上答听众问	
弦歌不辍 精神不死	199
——答新华社记者任沁沁等问	
大学的内迁与内迁中的学人	206
——答腾讯文化记者陈文嘉问	
弦歌不辍 艰难玉成	218
——答《贵州都市报》记者姚曼问	
史家的学养与文人的情怀	224
——答《北大青年》记者陈雪问	
如何超越“纪念图书”	232
——答《南方》杂志记者向松阳问	
中国大学的影响力比排名高	238
——答《长江日报》记者宋磊问	

## 中文系

- 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 247  
——答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问
- 在“史学品格”与“现实感怀”之间 267  
——答《文学报》记者何晶问
- 学者风范与学人本色 282  
——答湖南理工学院余三定教授问
- “我在中大康乐园完成了精神蜕变” 295  
——答《广州日报》记者赵琳琳问
- 每一次学术转向的背后，我都有内在理路在支撑 299  
——答《南方都市报》记者李昶伟问
- 中文系就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 312  
——答《钱江晚报》记者屠晨昕问
- 中文情怀与大学教育 318  
——答《乌鲁木齐晚报》记者杨梦瑶问
- 北大与五四精神 325  
——答《东方早报》记者胡攀问
- “文学史”永远都在重写 331  
——答《深圳商报》记者夏和顺问
- 耳顺之年陈平原 339  
——与张双庆对谈人生与文学

年长一辈应为后来者搭建舞台 ——答新华社记者任沁沁问	353
对公众发言，必须坚持专业立场 ——答“腾讯文化”记者胡子华问	357
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播种的时代 ——答《凤凰周刊》记者徐伟问	369
小城文化与学者之路 ——答《潮州日报》记者邢映纯等问	378

閱  
讀





## 惟愿一辈子读书

——答《新京报》记者吴虹飞问

1984年，我30岁，念完硕士，北上求学，王瑶先生收我为北大中文系第一届博士研究生，应该算是个人学术生命中的转折点。记得当时北京的柳树和迎春花生机勃勃，而琉璃厂的古书和故宫的红墙绿瓦，也令人心醉。

那时北京的生活很不方便。广东人经常要洗澡，来了之后不能够；广东人比较讲究吃，而当时的北京则不然。我还记得去买胖头鱼，我问师傅是死的还是活的，被他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通：你什么时候见过活的鱼啊？当时北京不产鱼，没有活鱼。还有一次买鲤鱼，我问他要一条公的，因为广东人吃鲤鱼，是分公和母的。那人还以为我在取笑他。

尽管生活差异很大，但是北京的文化环境和学术氛围，还是吸引了我。

“今年是中国建立博士学位制度的20周年。20年前拿到博士学位，并没有别人想象的那么激动。自己到未名湖边拿完就回来了，也没有戴博士帽。不过路上买了一个很大的西瓜，在宿舍里冰了大半天，晚上就吃西瓜，庆贺了一番。

别人问我，当博士意味着什么。拿到博士学位的那一刻，我最明晰的就是：自己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一辈子读书了。

现在的孩子上学是很自然的。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则不然，读书和不读，只是擦身而过的机会。我们那时候不容易有机会读书，如果有，也只是命运的偶然。能够读到这个地步，能够在大学里有一份教职，很不容易。相比我的同辈人，我是很幸运的。时至今日，少时山村里昏黄的灯光，深夜中遥远的木屐，盼望雨季来临以便躲在家中读书的情景，仍不时闯入梦境。

1969年初中毕业，由于父亲被批斗，不能再继续念书。回到潮汕老家的一个山村插队，很快我就当上了当地的民办教师，就像阿城的《孩子王》那样的，16岁开始教书。当时教孩子和现在不一样，先要教他们上课不能尿尿，突然学生会站起来，老师——我要尿尿。你告诉他，上课是不能尿尿的。等到下课的时候，他就叫：老师——我的裤子湿了。我就是从这样的孩子开始教起，一直教到五年级。

潮汕地区的人，长大之后可以下南洋，走北方。而我们下乡的时候，不能去四方闯荡，到省城去，是要开证明的。一直到了上大学，我才看到了火车。农忙的时候下地干活，我第一天劳动，村里的父老乡亲照顾我，让我扛两把锄头，走了六七里地就累得够呛。晚上读书，有时有电，有时没电。最向往的是下雨天，这样可以躲在家里读书，而雨天读书，又有更多的失落。我在乡下待了八年，包括青春的懵懂冲撞，伴随着整个时代的变化，那时候的苦闷，是觉得前途渺



茫，不知道路在哪里。最落拓的时期，恐怕就是在这一段时光。我当时以为，我们三兄弟，都会“屈死”在这个小山村里。当时说了，让父亲很伤心。

但我一直有一个愿望，一种冲动，如果有机会，我还想继续读书。

1971年，“读书无用论”还很盛行，我工作也很顺手，但我做了个决定，辞职去念高中。放弃做老师来当学生，对我来说是第一个坎。我的成绩，平均每门都是99分以上。那个高中至今没有这样的记录。

第二个坎是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我高考报的第一志愿是中山大学，第二志愿是华南师院，第三是肇庆师专。我的愿望十分简单，只要能够念书就好。

这些强烈的读书愿望，决定了我的生命历程。

父亲的书房必然影响孩子的趣味。父亲是当地中专的语文教师，自己也写诗，写散文，喜欢买书、藏书。在当时，他的藏书算是很多的了，尤其是文学和史学，所以我的趣味偏好于此，也是有渊源的。他喜欢古代文学和外国诗歌，前者对我影响深远。外国诗歌我读的是莱蒙托夫、普希金等。

“文革”期间，学校关门，图书馆也关门了，外面的革命乱哄哄的，多亏父亲的那些藏书，让我那些年头没有完全荒废。

最早读的，你想不到，其实是各种语文教材。各个年代的语文教材，父亲都保留下来。那时初中高中的语文教材我都读完了，从中了解古今中外文学的基本知识。

我父亲中学没有读完就辍学了，但是受新文化的影响很深，甚至影响到他的生活和观念。他特别希望我能读北大。日后我跟从的老师